

周穆王欲肆其心？——《穆天子傳》中的 巡遊書寫與其事類隱喻

劉苑如*

摘 要

本文擬從英雄神話的敘述特質，重新解讀《穆天子傳》——這部最完整鋪寫周穆王巡狩事蹟的著作，不管其是否被辯證為歷史書寫，抑或摻雜了後人添加想像力的神話敘述構成這部傳記體的事件，都因其人性化的敘述，使其巡狩的遠征性質，得以在不同的敘述文本中被重新詮釋，形成一個鮮明的事類、典故，發揮原型人物的隱喻作用，在文化價值及意義上遠逾於歷史的真實性。依據這一論述旨趣，本篇將先廣引歷史學的論證，剖析出最接近於當時歷史中的周穆王形象；然後從《穆天子傳》中選取構成巡狩敘述的兩大單元：郟公謀父的勸諫與突破勸諫的遠征、河宗氏的先導與指導、造父之御與寶馬敘述，最後則結以美人的追尋與死亡。從這些傳奇性的事蹟可據以詮釋：穆天子其人為何被原型化？巡狩的遠征情境被事類化的敘述成因，這種英雄神話的千面性為何需有寶馬、美人相稱？由此可以論證中國文學傳統中一種隱喻性事類的形成，如何被賦予超乎歷史價值的隱喻功能與意義。

關鍵詞：穆天子傳、巡遊、事類、隱喻、英雄神話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Does King Mu of Zhou Want to Fulfill his Wishes? — Examining Medieval Writings of The Investigative Expedition and Metaphorical Allegory in *Mu Tianzi zhuan*

Liu Yuanj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eroic myths in order to re-interpret *Mu Tianzi zhuan* (穆天子傳) — the work which thoroughly describes the events of the investigative expeditions of King Mu of Zhou (周穆王). Its status as a historical text or as a biography, constructed out of narratives, which includes the later interpolations of imagined myths, is disputed; but regardless of this, this text's personalized narration allows the unique qualities of distant-land investigative expeditions to be interpreted anew in different narrative modes, forms distinctive analogies and classical allusions, and elaborates on the metaphorical use of archetype characters: its cultural value and meaning far exceeding the reality of history. Based on these main discursive points, this article will draw broadly on historical evidence to analyze that image of King Mu of Zhou, which most closely corresponds to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his time. It will then select two major episodes which construct the narrative of the investigative expeditions — the remonstrance of *Jigong Moufu* (祭公謀父) and the breaking of it to proceed to expedition to far-off places, the guidance and direction of the House of *Hezong* (河宗氏), the imperial carriage of *Zaofu* (造父) and narration concerning precious horses, to finally end with the pursuit of beauties and death. Based on these ev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tales of the extraordinary, we can explo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did King Mu of Zhou become

an archetypal figure in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How does the origin of the narrative events on the distant-land expeditions turn into analogies? Why does this unique heroic myth involve precious horses and beauties? From these questions, we can argu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taphorical allus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nd how it is given the metaphorical function and meaning which transcends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Mu Tianzi zhuan*, investigative expeditions, analogy, metaphor, heroic myths

周穆王欲肆其心？——《穆天子傳》中的 巡遊書寫與其事類隱喻

劉苑如

一、前言

《穆天子傳》自西晉汲冢出土以來，歷來對於此書的真偽即有迥異的看法¹，在今人的理解中，穆天子故事常介於歷史、神話與寓言之間，乃是由許多史實、想像和譬喻所拼貼出來的文本，卻構成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重要的帝王事類典型。這種典型的形成，奠基於周穆王（姬滿，一說 1001-947 BC.）個人的高壽與多次巡遊的行動力，而在先秦兩漢歷史、哲學與諸子寓言等不同類型的文本中，經由同中有異的敘述而形成文化傳統中的一種固定化形象，歷來受到許多的關注。魏晉以來，隨著新時代因素的加入，穆天子活躍的身影依舊，卻鋪陳出不同以往的面貌，逐漸超越傳統征遊四方的雄主形象，在其多元個性中又增添了好奇求仙的仙道因素。²事實

¹ 《穆天子傳》，又名《周王遊行》，作者不詳，為西晉初年汲冢魏墓所出土的大量簡書中的一種，經當時荀勗（?-289）、束皙（?-300）等人整理分為 5 卷，後又將雜書中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併入，共 6 卷。對於《穆天子傳》的成書時間，一般學者認為該書約成書於戰國時期（如：王謨、衛聚賢、顧頡剛等）；也有提早自春秋，甚至西周時作（如胡應麟、顧實、丁謙等）；清代姚際恒（1647-1715）是力主《穆天子傳》為偽書的代表。他認為《穆天子傳》源出《左傳》、《史記》，多用《山海經》語，體例則類似起居注，應當是漢朝以後好事者的偽作（見《古今偽書考補正》）；另有主張該書是西晉時的偽作。相關論述可詳參鄭杰文：〈關於《穆天子傳》出土、整理、流傳諸問題的考辨〉，收入於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古籍整理與研究論叢》第一輯（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頁 57-76；周書燦：〈《穆天子傳》研究論述〉，《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2（2003.3），頁 58-65；顧曄鋒：〈《穆天子傳》成書時間研究綜述〉，《長春理工學報（高教版）》2：4（2007.12），頁 47-53。

² 周穆王的事蹟除了可見《左傳》、《史記》、《國語》、《逸周書》等史書，亦可見於《尚書》、《孟子》、《論衡》、《潛夫論》、《風俗通義》、《孔叢子》，儘管評價不同，尚且都還是一位征遊四方的君主，直到《列子·湯問篇》則將其遊蹤擴及不知際畔的北終國，〈周穆王篇〉則是沈迷於西極之國的化人的

上，在古帝王的群像中，傳說中的周穆王原本即與堯、舜、文、武等聖王的形象頗為不類，主要的原因就在其「巡狩」的遠征事蹟，較諸黃帝、舜、禹等古帝王的巡狩神話，儘管其事蹟較為豐富，卻始終缺少一種聖王巡遊的神聖性與正當性，而往往在儒家典籍中被冠上「欲肆其心」之名，以詮釋其征伐野心，而其西會王母的行動更成為中國古帝王遠遊的荒誕事例。對照兩組帝王巡遊的古史神話，其中透露了諸多亟待詮釋的消息。

根據帝制中國所建立的帝王理想原型，凡人君者聽政必居於中，正是取譬於天象中的北辰，居天中而不動。若要離開帝都之「中」而向外行動，特別向周邊展開大規模的巡遊，就必須在政道上具有正當的政治意圖，才能符合王道仁政，此即《尚書·周官》所建立的理想體制：「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³意謂著帝王巡遊天下，必須以視察境內四方諸侯是否遵循制度、服從領導為名，方合巡狩的禮制。歷代史籍莫不重視巡狩禮制，因而反覆出現以巡為語幹的複合詞，形成諸多語意相關的語彙，像是巡省、巡幸、巡狩、巡遊等，皆是指稱帝王出京而巡視地方與邊疆的行動；特別與「狩」字複合時，則往往在巡視中「假」田獵之名而行武力征伐之實。根據何平立的歷史考察：巡狩起源於上古軍事民主制時期部落聯盟的主要方式；迄至先秦時期，巡狩已逐漸演變為一套具有政治、軍事行動色彩的禮制：君王即以考察制度為名，合理化其對四周部落、方國以及諸侯封國進行巡察、征伐等行動，以此控制王土、鞏固王權，故成為王朝禮制中的重要舉措。至西周以後，巡狩制度漸有所變化，刀光劍影的武力征伐性質逐步淡化，而安邦定國的政治功能日益彰顯。春秋至秦漢，在儒家思想的文化建構下，巡狩被禮儀化為一種正確的政治指導原則：「天子非展義不巡守」⁴，意謂著巡狩至此已不僅已制度化、系統化，同時也被禮儀化、道德化，其歷史文化涵蘊和意義亦日漸廣博、深遠。首先，就是禮制的重要意

君王；另外《拾遺記》則極寫八駿神異，並且認為正是穆王神智遠謀，才能使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逐漸使穆王的巡遊轉變為仙遊，為後來遊仙詩中的求仙君王的形象做好了準備。

³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注：《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周書〉，卷 18 〈周官〉，頁 271。

⁴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卷 10 〈莊公二十七年〉，頁 175。

涵被確定為一種吉禮，巡狩既是祭祀天、地、君、親、師、社稷、鬼神；後來到唐宋以後多元化發展，既衍變為嘉禮性質，表示其和親萬民，並包含親邦國、朝覲、交聘、通好、交際之賓禮；並及於哀邦國、悼亡、救患、問疾、恤災之凶禮，亦視同邦國、耀武、征服不馴的征伐之軍禮等。故巡狩是禮俗社會中一種王權政治體制的正常運作模式，展示一種理想化政治空間的思想實踐，形成儒家以禮為教、以祭為教的禮儀文化，故歷代均能與王朝體制緊密聯繫，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等諸方面，藉由體制讓帝王發揮調控、整合諸侯王、藩屬的禮節功能及意義。⁵

相較於儒家的巡狩論述，儘管周穆遠征的正當性受到史家、思想家的質疑，但弔詭的是其巡狩神話在後人的敘述中反而被反覆複製，關鍵之一即是《穆天子傳》的出土，西晉太康之後，即有陸續出現多種寫本、注本，統計歷來校釋註本不下四十餘種⁶；更重要的文學事實，則是後來在事類中的運用，這種交織著巡狩神話與歷史敘述的傳記體，由於選擇性地保存了周穆傳說中最生動曲折的人性面與想像性，而廣受徵引。過去研究已多有使用出土的青銅銘文、《竹書紀年》與其他相關周王朝的歷史記事作對照，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評價該書記載的真實性及意義。⁷本文則將從英雄神話的敘述特質，重新解讀這部穆天子的巡狩事蹟，不管其是否被辯證為歷史書寫，抑或摻雜了後人添加想像力的神話敘述，重構成今本傳記體的關鍵事件，都因其人性化的文學敘述，使其巡狩行動的遠征性質，得以在不同的敘述文本中被重新詮釋，因而形成一個意象鮮明的事類、典故，在文本中發揮原型人物的隱喻作用，故在文化價值及意義上遠逾於歷史的真實性。依據這一論述旨趣，本篇將廣引歷史學所論證的，剖析比較接近於歷史層面的周穆王形象；而論述的重點則從《穆天子

⁵ 見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濟南：齊魯書社，2003）。

⁶ 詳見鄭杰文：〈《穆天子傳》知見版本述要〉，《文獻》2（1994），頁170-196。

⁷ 相關研究頗多，如楊樹達：〈毛伯班簋跋〉，收入於氏著：《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52），頁103；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另王貽梁〈《穆天子傳》的史料價值〉一文曾專門就《穆天子傳》在歷史地理學、先秦史、經濟史、科技史、民族史、文學史及語言文字學、禮制民俗等學科領域的價值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參見王貽梁：〈《穆天子傳》的史料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1994），頁51-55。其中楊寬《西周史》分析了河宗氏祖先神話傳說的真實性和周穆王西征史跡的真實性。對於《穆天子傳》所述及周初歷史的正確性作了頗為全面、深入、系統的考察。參見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99），頁603-622。

傳》選取構成巡狩敘述的兩大單元：鄒公⁸謀父的勸諫與突破勸諫的遠征、河宗氏的先導與指導、造父之御與寶馬敘述，最後則結以美人的追尋與死亡。從這些傳奇性的事蹟可據以詮釋：穆天子其人為何會被原型化？巡狩的遠征情境如何被事類化？以及構成英雄神話的千面性為何需有寶馬、美人相稱？由此可以論證中國文學傳統中一種隱喻性事類的形成，如何被賦予超乎歷史價值的隱喻功能及意義。

二、巡狩事蹟中穆王的事類化

在中國文學的書寫傳統中，文人喜愛故事、成辭的「說話」趣味，表現在不同的講述者，不管是單純的說理論述，抑或徵引繁富的文史書寫，還是賦加了想像性的小說敘述，時常運用歷史性、故事性的事類、典故，逐漸形成一種文學隱喻。事類作為中國屬文、立論常見的一種修辭手法，一般分為兩種：一是直接徵引前人的佳句；二是援用古人的事證。中國人好用故事、成辭的習性，即是建立在信古、好古的文化傳統與實踐體驗之上。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事類》解釋道：「取古事以托喻，興之屬也。意皆相類，不必語出於我，事苟可信，不必義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達吾之思而已。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徵於舊則易為信，舉彼所知則易從」⁹，說明了事類的運用原則，基本上就是取譬引類，以起發己心——「興」的手法，即根據「徵於舊」和「舉彼所知」兩種原則，掌握「舊則易信」、「知則易從」的心理基礎，正是古人取得信賴、建立共識的實踐邏輯。因此當一個文學隱喻被創造出來以後，在文學社群的社交圈間成為一種共同的文化資源。這種文化符號、文化象徵即為這一文化圈所共享，從此時常在文學創作中運用，或作詩引喻，或在敘述文類中被不斷改寫、翻新，構成一種新的隱喻。這種文學藝術的文化品味，具有其階級性、品第性，若欲加入這一文化圈就需擁有這種品味能力，才能被認為風雅，共同擁有

⁸ 先秦和兩漢古籍中，大部分都是寫作「祭公」，僅《穆天子傳》寫作「鄒公」。因此本文原則上都寫作「祭公」，但在論述《穆天子傳》時則寫作「鄒公」。

⁹ 見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事類〉，第一則，頁187。

同一文化階層的雅趣。這裡即以周穆王為例，探討周穆王故事如何形成典範？如何作為「事類」以說理？周穆王好遊的歷史典型，為何可以成為同時兼有正、反兩面的人物典範？其正反兩面的意義到底又如何轉換？涉及怎樣的修辭思維？從而檢討事類與隱喻間的關係。本文即從第一部以周穆王為敘事主體的《穆天子傳》解析入手。

帝王的巡遊行動，在中國傳統中常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多重意義，歷史上相關記載的傳說甚多，從《尚書》、《禮記》、《孟子》到《史記》，既已記載了上古時期黃帝、舜、禹等帝王巡遊的事跡。較早者即如《尚書·舜典》所云：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後。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¹⁰

歷代經學家都將這段記載視為巡狩制度的典範，也即是天子五年一狩的經典依據。東狩之前，四岳群牧先覲見帝王，帝王藉此把瑞玉頒發給天下諸侯，作為帝王對於天下諸侯具有任命權的象徵，並且配合著望祀山川群神和祖先的祭祀活動，藉由尊天的祭祀以達重人的目的¹¹；而諸侯也必須每年朝見天子一次，第五年則接受帝王的視察，在禮樂曆律和度量衡等制度上皆必須一統於王朝。然而這種古史傳說中的巡狩制度在實際的歷史情境中是否曾真正運行？則不無疑問。一般學者認為五帝時期應該是不定期、不定地域舉行巡狩。¹²相對於五帝的巡狩事蹟，周穆王的巡狩事蹟則範圍更廣，事蹟更多，包括北征西戎，南征淮夷，周行四海，故為古帝王巡遊中最具代表性者。基本上，這些帝王巡祭名山大川的逸聞，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流傳很廣，儒生有意建構並加以理想化，而在諸子百家不同的思想話語中則逐漸發生多元的變化。

¹⁰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注：《尚書注疏》，〈舜典〉，卷3〈虞書〉，頁35-38。

¹¹ 參見韓梅、孫福軒：〈「望祭」、「望祀」議〉，《中國史研究》4（2006），頁8。

¹² 參見李凱：〈五帝時期的巡狩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3（2008.6），頁147-152。

有關周穆王的巡狩事蹟如何被事類化，這必須要比較《穆傳》被發現之前的巡狩史。從先秦到兩漢，巡狩作為一種歷史敘述，已在先秦儒家的反覆徵引、闡述中，都被當作一種理想化的禮制，表明為王之道的王道思想。在「中央—四方」的施政體制中，如宗周的中央王朝如何面對四方邊裔的紛擾、不靖，亟需建立中央政權的權力象徵：此即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¹³。這種傳說中古代聖王即已擅用的王制，在早期本具有濃厚的軍事行動的作用，譬如傳說舜南巡狩，實際是南征三苗¹⁴；而禹也傳說曾南巡狩、征三苗，獲得大勝，並且還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¹⁵另外根據金文資料，學者研究指出，金文中常見的「征」一詞，應表巡行、巡狩，如啟卣銘文說：

王出獸南山，搜山谷。至於上侯澆川上。啟從征，謹不夔。(啟卣《集成》10.5410)

這裡的從「征」指的就是從王至南山「獸」，也即是古代君王在巡行過程中經常進行田獵一類的活動。¹⁶由此可見，無論是征伐或田獵行動，其實都還是不定期的軍事行動或操練活動。真正趨於制度化、禮制化的關鍵時期，則要到宗周王朝，武王初定天下之後，才轉化為一種具體實踐的統治手段，何立平在其研究中曾有生動的描述：「巡狩是一根鐵與火、刀與血錘鍊成的、維繫王權與諸侯四夷關係的鎖鍊。」¹⁷

在巡狩制度的發展、衍變過程中，西周朝之所以成為一個關鍵時期，主要在歷代周王為了開拓、維護王土、王民的王威，積極從事這種軍事行動的展示、宣揚，故相關史料的記載較多且明確。而在西周諸王的巡狩事蹟中，最常被史家舉為例證

¹³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季氏篇〉第十六，頁147。

¹⁴ 見《淮南子·脩務訓》，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19，頁630-631。

¹⁵ 見《國語·魯語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點組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5〈魯語下〉，18則，〈孔丘論大骨〉，頁213。

¹⁶ 參見商豔濤：〈金文中「征」值得注意的用法〉，《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2007.10），頁143-144。

¹⁷ 見何立平：《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頁39。

的，就是昭王南征與穆王周行天下，昭王征楚、穆王征犬戎，其原因都是由於南楚、戎狄的「不貢」，而諸侯不朝貢也就是不臣服的政治標誌，故周王為了確保諸侯對於帝王的臣服關係，就需以天子的身份親自巡狩征伐。

巡狩行動作為彰顯「中央—四方」模型的象徵實踐，也就是將中央意識的建立與上帝、天命結合，《尚書·召誥》曾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¹⁸《逸周書·度邑解》也表明周之取天命乃代商而起，故曰：「嗚呼！且！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¹⁹而在先秦諸子則是強調政治版圖、文化地理的中央，如《孟子·盡心》所說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²⁰；《荀子·大略》則從禮制觀點論：「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²¹建立中夏、中原的「中國」觀²²，就形成體制上的祭祀活動，如巡狩至岱宗時「柴而望祀山川」²³，故穆王在巡狩過程中，巡狩所至或與諸侯會盟，必親自祭祀山岳，若不能親祭則採用望祭，這種祭禮就是使用祀事以美化、掩飾其軍事上的戎事。穆王就是以王者順應天命而巡狩四方，在綏服之地祭祀名山、大川時，諸侯皆從而助祭，也就表示述職之意：恭順謙卑以助成祭天，這就是神道可以安邦定國。周穆王的塗山之會，就是藉塗山為大禹的聖蹟之地會盟，穩定東夷。

巡狩大事原本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但在宗周王朝陷入分崩離析的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諸子不僅對周朝所建立的諸多禮制亟欲恢復，還托古以寓託其政治理想，所以在其「立言」講學中，就選取「巡狩」作為建立仁政的王道理想，設想帝王應

¹⁸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注：《尚書注疏》，〈周書〉，卷 15 〈召誥〉，頁 221。

¹⁹ 見清·朱右曾校釋：《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卷 5 〈度邑解〉第四十四，頁 1954-2。

²⁰ 見漢·趙岐注，宋·孫奭正義：《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卷 13 上 〈盡心〉，頁 233。

²¹ 見《荀子·大略第二十七》，李滌生集釋：《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599。

²² 參見 Peter Bol, "Ethnicity versus Culture under the Empire." 見漢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中研院文哲所共同舉辦之「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3.26-28），會後收入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64-67。

²³ 見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卷 11 〈王制〉，頁 226。

如何君臨諸侯、邊裔？而諸侯、邊裔又如何應對帝王？這一原本作為周王體制中的王朝禮，可從現存《三禮》中見其規範巡狩的行政設計，而諸子中《孟子》亦曾提到的，皆明顯地藉由理想化君臣之道，反映出末世時代憂患意識中的王政理想。二者對照列敘於下，《禮記·王制》曰：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²⁴

又《孟子·告子下》曰：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²⁵

從以上記載可知，巡狩制度被視為理想化的王道，在觀風省土等目的之外，亦寓含了懲罰權，認為要維護王權的統一，使諸侯處於臣服關係之下，就得動用武力作為後盾，嚴厲懲罰違反制度者，但在禮儀的關係上，仍必須採取狩獵、祭祀的名義，隱藏其軍事征伐的性質。因此這裡特別強調「適諸侯」討而不伐者，也就是強調王之巡狩天下，只能以六師討誅諸侯，懲罰其不敬、不順、不孝、不從與畔逆等行為，而不可無故侵伐其領域，既表明了大一統的意識，又展現了對武力的自我節制，故以禮制的名義約制其行動，藉以維護君／臣的相對禮制關係。從《周禮·秋官·大行人》所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²⁶一句，就可見帝王／諸侯間那種既緊張又懷柔的關係，而巡狩的目的一方面欲振興中央王朝的王權，另一方面又得顧及安撫

²⁴ 見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卷 11〈王制〉，頁 225-226。

²⁵ 見漢·趙岐注，宋·孫奭正義：《孟子注疏》，卷 12〈告子下〉，頁 218。

²⁶ 見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賈公彥正義：《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卷 37〈秋官·大行人〉，頁 565。

邦國諸侯所作的禮制規範。故在《左傳》、《國語》、《史記》等經、史的記載中，對於周王征討周邊諸侯究竟是否有其絕對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不再僅有定於一的唯一論點，反都運用了儒家經典史策中的「微言大義」，採取一種批判的觀點，質疑其武力的正當性。究其實，凡此皆反射出這一史官傳統的時代焦慮，面對春秋以來挾尊王以行擴張之實的新興政治勢力，對其層出不窮的武力行動，既有所期待，又懷抱著高度的不滿。舉例來說，《左傳·昭公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²⁷事實上，這就是楚國子革用穆王作為典故，藉以對照出楚靈王伐鄭的野心，也代表了春秋時期對周穆王所形成的某種印象。

相對來說，西晉新出土、整理和重輯之《穆天子傳》則不同，其所提供的歷史與神話敘述，正可以彌補先秦到兩漢歷史記載之不足者，既具體描述了巡狩的歷程²⁸，也彰顯出對於王權巡狩正當性的思考有不同的敘述聲音，同時經由《穆天子傳》的小說敘述，都強化了當時人對於這位聖王在巡狩史上的印象。其中既有軍事權威的宣示，也有祭祀神權的張揚，將穆王的中央王權藉由遠征途中的事蹟而神化。既神化其事也就神化其人，使巡狩中的穆天子從歷史人物增添神話的色彩，一躍成為神話英雄。事實上，西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始終不斷舉兵反晉，先後有三個刺史敗死²⁹，對於能夠綏靖邊境的英雄故事應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若將研究目光集中到《穆天子傳》出土、整理和重輯的太康年間（280-282），就更加明顯——晉武帝（司馬炎，236-290）大軍伐吳，隨著孫皓（242-284）出降，江左初定之際，晉統邁向一個新的階段。³⁰然而在政策研究之餘，亦不能忽略中古時期君臣關係的建立，絕非武力

²⁷ 見唐·孔穎達等正義，唐·陸德明釋文：《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卷45〈昭公十二年〉，頁795。

²⁸ 見何立平：《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該書即以穆王為例，見頁44-50。

²⁹ 見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3〈武帝紀〉，頁59-60。

³⁰ 李海默在〈「翦商之志」的落實：再論晉武帝的建政地理模版〉一文，引《晉書·帝紀第二》：「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用「翦商之志」描繪晉武帝的時代心態，並說明其如何借鑑春秋戰國、秦漢三國以來中央—地方行政控制的經驗，擬於王畿四方建立眾多同姓與亦姓諸侯，接續前朝開發之地方基礎，形成以同姓為中心的政權。對於本文更有啟發性的論點在於晉武帝如何從前代擷取可能存在的知識資源，特別是儒家經典，而其中荀勗建言與謀定又具有關鍵地位。見李海默：〈「翦商之志」的落實：再論晉武帝的建政地理模版〉，《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11），頁5-25。

征伐就可強制而成，必須通過「義合」的締結關係。³¹因此，早在伐吳之前即以懷柔政策處理雙方的邊界問題，滅吳之後又以優異的待遇號召江東名士接受辟召；另一方面，從江東士人的角度來說，則必須接受此一滅國的命運而重新面對新君。³²對於此一相關議題，過去史學研究者不乏論述，本文不再多論；而將進一步地設問：西晉的這項政治工程是否涉及某些文化工程？《穆天子傳》可否提供一種可能的知識資源？又相較於孟子、荀子當時對行擴張政策的新興政治勢力深懷憂患的時代氣氛，究竟又有何異同？根據史載：荀勗(?-289)博學多才，入晉後曾和賈充(217-282)一起修訂法令，掌管樂事，修正律呂；又曾與張華(232-300)用了大約六年的時間，按劉向《別錄》整理典籍，對十萬餘卷圖書進行整理復校。儘管在伐吳大業之初，荀勗曾結黨於賈充、馮紆等人，與羊祜、杜預、張華、王濬等針鋒相對，固諫不可，然在武帝的堅持之下，專典詔命，武帝曾讚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眾也」；天下一統後，對於諸王、異姓領土的分封調整，每問荀勗，且多從其意。史稱「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³³由此看來，荀勗當時親自整理竹書，隸定古文，還以當時的歷史知識「注寫」簡文，而後列入國家特藏，絕非只是文獻上的意義，而不無揣測上意，並建立政治典範的人文意涵。這部詳細敘述一位聖王的巡狩之威的《穆天子傳》，在當時所引發的閱讀反應，恰能提供一個重新體會巡狩深意的時代情境。³⁴相較於歷史記事性質較強的《左傳》、《史記》，這部帶有更多神話敘述趣味的《穆天子傳》，其研究價值應不僅止於今人從學術上所作的史實之論證，後來甚至更超出朝廷所預期的視野，而在兩晉南北朝人的書寫編纂中形成事類，從其歷史原型出發，另賦予更具有當時意義的生活

³¹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君臣關係初探〉一文，即提出「義合」的觀念。見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君臣關係初探〉，《臺大歷史學報》21（1997.12），頁32-34。

³² 相關研究頗多，前者如陳森：〈滅吳前後的晉武帝〉，《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989），頁50-56；後者如渡邊義浩：〈陸機の君主觀と「弔魏武帝文」〉，《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49（2010.3），頁27-52。

³³ 見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卷39〈荀勗傳〉，頁1152-1157。有關荀勗研究，可參見黃光：〈荀勗在目錄學領域中的貢獻〉，《學習與探索》11（2008），頁146-147。

³⁴ 本文雖可以將周穆王與晉武帝的生平事蹟做更多的比附，比如四十歲左右始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寵愛女色……等等，但筆者認為這種索引式的閱讀即失去了事類隱喻的能指與所指多重指涉的可能性，寧可只作原型的追索，而以留白的方式留予此一文本多方詮釋的空間。

氣息，重新使這一沈埋的歷史成為反映當世的生命隱喻。

三、歷史原型：法祖、重禮與高壽之聖王

周穆王之所以能具有豐富的詮釋角度，實與其本身戲劇性的歷史原型有關。因而討論周穆王的歷史事蹟，就必須回顧當他繼位時的歷史情境。根據史籍、金文，都有許多他的父親昭王伐荊楚、淮夷的記載；雖然曾有令東夷、南夷廿六邦來朝的盛況³⁵，但長期軍事征伐的結果，也就如〈施旗鼎〉所記的，曾產生軍心浮動的緊急時刻。³⁶特別是如今本《竹書紀年》所云：「（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兇；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暘，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³⁷《史記·周本紀》更詳言其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³⁸可見穆王乃是在昭王遭遇不幸，兵敗溺死於漢江之後，才以五十歲之齡倉促繼位。緊隨而來的，他需面對戰爭不力、國勢衰微、王室不寧的局面，這些都亟待其發揮能力、勵精圖治。《尚書》中較早的相關記載，〈君牙〉篇曾記周穆王任命君牙為大司徒，要求他「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也即是囑付其敦厚人倫五常，作為百姓的準則；從〈呂刑〉尚可窺知穆王曾命呂侯廢除嚴酷的舊法，參照夏朝的贖刑制度，作刑書頒佈天下的用心³⁹，《漢書·刑法志》亦有類似的記載，傳為五刑創制的端始，承襲了周初以來「慎德明罰」的傳統⁴⁰；另外，〈伯冏〉篇記穆王命伯冏為

³⁵ 見「宗周鐘」銘文，詳參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179-183。

³⁶ 參見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殷商史研究中心編輯組編：《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244。

³⁷ 見梁·沈約注，洪頤煊校：《竹書紀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下，頁43。

³⁸ 見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4〈周本紀〉，頁134。

³⁹ 參見程元敏：〈《尚書·呂刑》篇之著成〉，《清華學報》15：1/2（1983.12），頁1-26。

⁴⁰ 參見王保國：〈從《呂刑》看明德慎罰思想在西周的演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1（2003.1），頁27-30。

太僕正，令其慎選僚屬，糾過得力。根據《周禮》，太僕正為太御眾僕之長，主管朝儀的主管，也即是作為王與諸侯之間的橋樑。這個制度規定了王與諸侯之間存在一定的禮數，《史記·周本紀》言王道因而復寧。⁴¹其次，在《逸周書》中有〈祭公解〉，顯示周穆王尊崇股肱之臣，在祭公病危之際，虔敬地詢問其治國之道；〈史記解〉言穆王集結往事值得警戒者，每月朔、望之日聽人講解的憂患意識；〈職方解〉則完全是典章制度的記載。⁴²凡此皆凸顯了周穆王在政治上的態度、主張和作為，可歸納為敬德、法祖、重禮、安民。

周穆王一生屢屢出遊征伐的事蹟，也曾留下不少的歷史記載。從金文記載來看，西周中期的周王朝也是四方不寧，多對東方和南方用兵，少數也記載了邢侯、晉侯對北戎與邶地的戰事。⁴³證之以文獻上所載，當時的東南方情勢緊繃，在《後漢書·東夷傳》即記載了穆王為防衛徐夷擴張，分出東方諸侯鎮守，使徐偃王得以趁機坐大，穆王因而舉兵。從《史記·秦本紀》另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驪駟、騶耳之駒，西而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⁴⁴；《史記·趙世家》也有類似的記載⁴⁵，顯然都已染上了一些傳說的色彩。穆王之世，對西北則有征伐犬戎的行動，《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則皆記載了穆王不從祭公謀父之諫，堅持對犬戎用兵，最後僅得到四白狼、四白鹿的獻禮而歸，外藩卻從此不來朝周之事⁴⁶；然《後漢書·西羌傳》則云：「至

41 參見葉達雄：〈西周昭穆恭懿孝夷時代的內政措施與對外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5（1978.6），頁4-6。

42 有關〈逸周書〉的時代與性質，可參李學勤：〈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序〉，收入於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集注：《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4。而有關周穆王的三篇記載，可參看趙奉蓉：〈虔虔在位追跡文武——《逸周書》中周穆王形象〉，《理論界》8（2008），頁129-131。

43 參見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殷商史研究中心編輯組編：《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頁245-247。

44 見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卷5〈秦本紀〉第五，頁174。

45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卷43〈趙世家〉第十三，頁1779。

46 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卷1〈周語·上〉，頁1；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頁135。

穆王時，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於太原」⁴⁷。許倬雲據郿縣出土懿孝時期的盩駒尊銘文為證，指出當時已非常重視馬匹的蕃息；而今本《竹書紀年》亦記孝王「五年西戎獻馬；八年，初牧予汧渭」⁴⁸，顯示從西北引進馬匹養牧的情形。⁴⁹因此周穆王以來重視馬政，對西北用兵漸增，以獲取馬匹；另在平定淮夷的戰爭中，馬匹應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應是可以推知的。

換言之，自從昭、穆之世，周人就積極從事東方、南方的征伐，擴大王土的經營。穆王之後，又制服了淮夷。衛挺生的研究指出：穆王以後，許多活動如發兵、錫命……都是轉移至成周。⁵⁰許倬雲也指出，成周的積存、貢賦，常備武力有不少是來自東方與南方的委輸⁵¹；相對來說，西北就比較安寧，征討行動也少了許多，而穆王的攻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曾獲取馬匹，並將其一部分內遷至太原。但西戎與華人雜處後，並未加強彼此的同盟關係，反而隨著穆王以後國力的下降，乃伏下了西周末年長期的邊境問題。⁵²

至此可從三方面綜合周穆王的獨特風貌。首先是空間，穆王作為一位西周時期關鍵性的帝王，他一方面展開西戎的征行，另一方面則承續了父親昭王在南方的經營，抵定東南淮夷的征伐，擴展西周的國土幅員，卻也是西周國力由盛轉衰的分水嶺。穆王周行天下，既具有開拓性，也是充滿爭議性的征伐行動；其次是制度，包括刑法的釐訂、太僕的設置、莽京儀禮的完成和廷禮的定型化。雖然這些措施不一定是從穆王時代才開始的，但卻是位居完成或定型化的關鍵期⁵³，而潛藏著豐富的創造的動力。最後則是時間，他五十歲即位，年至耄荒，據稱享有百歲高壽⁵⁴，相對於其父猝死於漢江，誠乃國瑞之象徵。凡此皆留予後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周穆

⁴⁷ 見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87〈西羌傳第七十七〉，頁 2871。

⁴⁸ 梁·沈約注，洪頤煊校：《竹書紀年》，卷下，頁 48。

⁴⁹ 詳見許倬雲：《西周史》，頁 184-186。

⁵⁰ 衛挺生：《周自穆王都洛考》（臺北：中華學術院，1970）。

⁵¹ 見許倬雲：《西周史》，頁 284。

⁵² 參見張廣志：《西周史與西周文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頁 237-241。

⁵³ 參見葉達雄：〈西周昭穆恭懿孝夷時代的內政措施與對外關係〉，頁 15-16。

⁵⁴ 見《尚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注：《尚書注疏》，卷 19，頁 296-1。

王乃由政治話語的歷史人物逐漸轉向多元敘述的神話形象。

四、英雄演義：鄒公謀父、河宗氏與造父之輔弼

在周穆王諸多的巡遊事蹟中最受到矚目的，就是曾乘坐八駿馬車西行至崑崙丘，與西王母會面，並且互贈禮品的傳說。這個傳說最初見於《穆天子傳》（或題作《周王游行記》），為晉太康 2 年（281）在汲縣出土的竹簡書之一。今本《竹書紀年》亦云：「十七年，王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招宮。」⁵⁵《史記·趙世家》則曰：「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⁵⁶這些歷史書寫也都接受了英雄、功臣、寶馬與美人等的基本元素，但若缺少了這些重要角色間互動關係的書寫，也就不足以構成一部影響深遠的英雄巡遊傳奇。

根據《隋書·經籍志》等書志的記載，《穆傳》一共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事；後一卷實取自雜書十九篇中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般學者研究該書，皆從先秦金石、載籍記錄、制度、曆法、用語習慣等加以考證，斷定其為戰國時期的作品。⁵⁷近來學界則從秦墓出土的〈歸藏〉中發現，其中已出現《穆天子傳》本事，而郭璞廣注的群書中，也包括《穆天子傳注》，亦屢屢引證〈歸藏〉，故推論〈歸藏〉與汲塚書的性質相近，同為歷史、傳說、卜筮、游獵、方物、談天等多樣雜揉之書，皆為當時新出土，且性質相關、來歷相同之材料，故可用以

⁵⁵ 梁·沈約注，洪頤煊校：《竹書紀年》，卷下，〈周穆王十七年〉，頁 45。

⁵⁶ 見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卷 43〈趙世家第十三〉，頁 1779。

⁵⁷ 相關研究甚多，如衛聚賢：〈穆天子傳研究〉，收入於氏著：《古史研究》第 2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187-245。顧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1：2（1951.7），頁 63-68。張心澂：《偽書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穆傳」條，頁 514-520。張公量：〈略論《山海經》與《穆天子傳》〉，《華北日報·史學周刊》，1934 年 11 月 22 日。張公量：〈《穆傳》之版本及關於《穆傳》之著述〉，《禹貢半月刊》2：6（1934），頁 18-27（總頁 220-229）。小川琢治：〈穆天子傳考〉，收入於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93-256。鄭杰文：《〈穆天子傳〉通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除校釋部份，還靈活運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知識來考證。

互相印證發明，認為該書應為戰國初期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的。⁵⁸

從《穆傳》的書寫形式來說，乍看類似起居注，屬於按日記事的編年體為主體的雜史，記述穆王率七萃之士，駕八駿之乘，造父駕車，領六師之眾西巡，絕流沙，征崑崙，長驅萬里，沿途畋獵、釣魚、祭祖和接受貢獻諸事；卷三即進入全書的高潮，專寫穆王為西王母的座上客，觴於瑤池之上，酬酢賦詩，流連而忘返諸事；尾聲卷六則鋪敘盛姬喪葬的盛況。因而有學者發揮胡應麟「頗為小說濫觴」之說⁵⁹，認為《穆傳》馳騁誇張的想像，使巡遊一事高度的理想化，藉以滿足戰國時期飽受戰亂之苦者對於天下統一、承平之世的內在渴望，可視其為最富史詩情調小說的開山始祖。⁶⁰但從近年來豐富的地下出土文物來看，《穆傳》的內容雖然多與神話傳說相涉，傳文在禮儀、地名、人物也有晚出的痕跡，但也「不盡為子虛烏有之說」⁶¹。楊寬則認為此書來自河宗氏世代口傳的祖先神話傳說，他將此書內容與其他趙、鄘等部族神話傳說比較後發現，其中河宗柏夭引導穆王西行的記載具有真實性。⁶²

無論《穆傳》的記載究竟符合多少西周史實，本文認為《穆傳》乃是從真實的人性出發的政治神話⁶³，兩代老臣鄒公謀父⁶⁴則作為穆公反照人心光譜的三稜鏡，他

⁵⁸ 參見朱淵清：〈王家台〈歸藏〉與《穆天子傳》〉，《周易研究》6（2002），頁9-13。

⁵⁹ 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三墳補逸·下〉，頁456。

⁶⁰ 參見楊義：〈《穆天子傳》的史詩價值〉，收入於氏著：《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76-107；馬振方：〈大氣磅礴開山祖——《穆天子傳》的小說品格與小說史地位〉，《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0：1（2003.1），頁83-88。

⁶¹ 見楊樹達：〈毛伯班簋跋〉，收入於氏著：《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04。

⁶² 見楊寬：《西周史》，頁604-608。

⁶³ 恩斯特·卡西爾在《國家的神話》一書中指出，現在政治神話並非無意識的自由想像下的產物，而毋寧為按照計畫，精心編造下產生的一套機制。它透過情感的巫術語言和高壓同化的政治儀式來麻醉人心。見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范進、楊君游、柯錦華譯：《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te*）（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頁363-374。中國古代並無如此精密的國家制度，《穆傳》也應非西周時作品，但是中國傳統則往往利用「先王」來創造政治神話。相關例證許多，可參見拙作：〈聖王·聖徒與凡夫——六朝漢武系列的編／寫系譜〉，收於劉苑如：《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與空間書寫》（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頁345-416。另外需要辯證的是，神話並非只是麻醉人心，誠如葛哈德·貝林格（Gerhard Belliner）所說「神話會取悅且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詮釋事物的意義，並且把事物納入體系，神話消除不確定和恐懼，建立且加強信心和信賴，幫助人們掌握生命，創造行為的典範（聖人、英雄），並且安定社會關係。」

雖每每誦詩勸誡，義無反顧地指出遊征不合先王之治處，並分析可能造成的惡果；但從《穆傳》中可見，在穆王的遠征行動中，他親自帥師從行，並擔任天子的受勞的角色。面對國家大事，他總是成為君王慾望與祖訓之間張力的調節器。在《逸周書·祭公解》的記載中，謀父臨終前向穆王提出五點勸誡：一是不要違反文武之道；二是不要以寵妾蔽塞正后；三是不要以小謀敗壞大事；四是不要以左右近臣危害大夫、卿士；五是不要以家相擾亂王室，而不體恤王室以外的人。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指出：「以上五者，必穆王生平嘗有此失，故舉以為戒。」⁶⁵祭公之言固然有其特殊的針對性，但這五點勸誡也指向為君者常犯的缺失，也有其普遍性，不必然全是對號入座的解讀，卻也觸及君王公、私領域迫近的衝突。

考諸《穆傳》，全書中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周穆王遊行的動因，但他的英雄本色乃是從一連串的「行動」考驗中淬煉出來。⁶⁶從卷一周穆王大朝于燕然山，大服南面立於酷寒中，就得到天帝的啟示，要他登崑崙之丘，觀春山之瑤。言下之意，乃是將遊行的動機訴諸天意。回顧穆王之父昭王喪六師於漢，南征而不返，《史記·周本紀》曰：「其卒不赴告，諱之也。」⁶⁷所忌諱者，除了有失帥軍情保密的考量之外，恐怕更忌諱的是為周王朝墜失天命的象徵。因此，如何獲得天帝的啟悟，證明天命仍在，沒有違反文、武之道，乃構造出政權合理化的政治神話，故展開遊征，尋求天命，無乃可視為新王繼位後的當務之急。

其次，《穆傳》又記穆王恐後世追數其田獵釣弋之過。表面上乃是其深恐後世對其遊逸過度的批評有所自警，然更深一層的意義，則是自忖其難免會遭遇鄒公謀父之類大臣，會向其提出「耀德不觀兵」的德治主張，反對其西征犬戎，於是因內心有所憂懼而先行自我防備。由於昭王南征不利，此時若即刻與淮夷再戰，在氣勢上

見氏著，林宏濤譯：《神話學辭典》（臺北：商周出版，2006），頁3。

⁶⁴ 參見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3（1988），頁9。

⁶⁵ 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113。

⁶⁶ 坎伯認為，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挑戰的人。他將英雄歷險的基本架構分析為召喚→啟程→歷險→歸返等步驟。參見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立緒出版社，1997）。

⁶⁷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頁134。

已衰了一截，因而將目標轉向西北，挑動西戎，取得與西王母之邦的勢力連結，就可增加對抗東南方對手的資源，並震懾與牽制犬戎。然而這種戰略仍有其風險存在，可能使宗周陷入兩面受敵的窘境。因此，征伐西戎究竟是否「以小謀敗壞大事」？不免使人心懷揣測，穆王本身恐怕也有所不安。這也是英雄書寫在行動的過程中，常會陷入一種混沌，或者迷途的狀態。不過，當他受到七萃之士的一段鼓勵之言：「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時，民□氏響□。何謀于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⁶⁸也就是提醒他王者執政之道首先必須考慮無害於天常，天子行樂，只要能與百姓共利，無害於天道運行，百姓生活也富裕安定，能與人民共利，就不失帝王之道。其實這應是主戰派一方針對反對者的意見，而提出積極的回應，故獲得穆王高度的讚賞。

同時，游行的征途中當然屢見艱險困難，像是卷一記北風雨雪，天子以寒故，命王屬休；卷三記天子渴于沙中，求飲未至；卷五記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哀民等等，甚至卷六穆王的愛妾盛姬因東獵受寒疾而亡。然一旦英雄開始邁向征途，就必須別無選擇地繼續前行。

在穆王西征的過程中，還有兩個關鍵性的輔助人物：河宗氏柏夭與御者造父。首推河宗氏首領柏夭，他擔任的是如同智慧老人（the wise old man）的角色⁶⁹，迎領天子舉行河伯之神而舉行隆重的祭祀典禮，傳達了天帝命穆王主理當世之事；及到崑崙參觀春山之寶的命令，還與天子「披圖視典」，正式成為周穆王沿河西征的先導，負責傳達王命，為王介紹諸國的情況，並受命接受獻禮。因此，在完成西行任務後，就被任命為河宗正，也即是安撫與獎勵戎狄部族首領的官職。換言之，在他的輔佐之下，周穆王達成了印證天命的天人大事，也協和了沿河邦國，以致於西荒諸國。

其次為御者造父及其八駿，則具有幫助者的功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王朝本有馬神祭祀的傳統。《詩經·小雅·吉日》：「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毛傳》

⁶⁸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 1，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9。

⁶⁹ 容格將集體無意識的內容，稱之為原型。他曾描述過眾多原型，智慧老人即為其一，代表著「知識、反思、灼見、聰明與直覺」。而這樣的原型普遍出現在神話、傳說與文學作品。參見 Herman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51。

解釋道：「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⁷⁰西周貴族重視馬力，崇祀馬神；而馬神就在於二十八星宿之東方蒼龍七宿的房四星所組成的天駟星，主良馬，周王常親自祠祀。⁷¹而八駿不僅對應天子四駕的禮制，或有與天駟對應之意。有關八駿的來歷，《穆傳》並未多說，只云：「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⁷²，並形容其坐乘「東南翔行，馳驅千里」、「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南濟於河。」⁷³即言其上、下於山脈、河谷之間，健步如飛。不過根據《竹書紀年》所說：「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⁷⁴；《史記·趙世家》亦說：「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騮、綠耳，獻之繆王」，可見八駿部分來自貢獻，但大部分還是由造父選馬、獻馬，以其識馬、御馬的文化與技術，建構了穆王遊征行動中優質的物質條件，也在遍地草場的西北諸邦面前，展現了西周寶馬的行動戰力等。然造父在《穆傳》中的記載，也不甚詳細，唯可知其從西行到後來的南征，始終「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擔任天子主車的御者，護送周穆王馳驅千里、周行天下，並在巨蒐氏之地，地位提昇，可與柏夭同為天子受獻；《史記》則明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穆王。⁷⁵由此可見造父不僅善御，而且懂得選馬，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從而跨入士大夫的行列。但御人得幸，在姬姓宗親鄒公謀父等人的眼中，這種人才晉用的時代變化，是否就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⁷⁶？還待進一步考證。總之，在《穆傳》中很明顯地將其退居於次要的角色，以凸顯了八駿的神異性，使之暗與來自天際的星辰相應，儼然成為來自上天的助力。

⁷⁰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小雅〉，卷10〈吉日〉，頁369。

⁷¹ 參見楊寬：《西周史》，頁827-828。

⁷²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1，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8。

⁷³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4，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18。

⁷⁴ 梁·沈約注，洪頤煊校：《竹書紀年》，卷下〈周穆王八年〉，頁44。

⁷⁵ 俱見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卷5〈秦本紀〉第五，頁174；卷43〈趙世家〉第十三，頁1779。

⁷⁶ 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卷55〈緇衣〉，頁931。

五、求女傳說：西王母、盛姬之邂逅

在《穆傳》的遊征過程中亦出現了兩位重要的女性：西王母與盛姬。根據《竹書紀年》的斷代，穆天子 15 年重作璧台，也即是《穆傳》第六卷記穆王西北征得到美人盛姬，為其作臺事。至於《穆傳》卷三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事，《竹書紀年》則訂在 17 年。學者認為《穆傳》的時間多有所錯亂的情形，卷五記穆王在中原巡行、狩獵，《竹書紀年》訂在 14 至 16 年之間，與前四卷穆王遠征西荒往返的內容不相連屬，乃是晉人整理原書已有所錯簡脫文之故。⁷⁷筆者以為，《穆傳》每卷的內容容或有所錯簡，但是若將卷五、六整個倒置於見西王母事件之後，則或許透露了不尋常的訊息。

重新梳理《穆傳》的敘述脈絡，若以西王母與盛姬兩位美人，作為周穆王遊征追尋的目標，則與屈原〈離騷〉以降，主人翁適遊天界，上下索求其理想的匹配對象的周流主題相仿⁷⁸，只是求女的喻意各有不同而已。《穆傳》前面四卷記周穆王從成周洛出發，過灋水，北征犬戎，歷陽紆之河宗之邦、西夏氏、珠餘氏及河首、西南向春山珠澤、昆侖之丘，西向春山之赤烏氏、轉東北至於群玉之山，以至於西王母之邦；凡經行一萬四千里，而苦心巡行後，乃得以會見西王母，贈以貴重的白圭玄璧和錦組素絹，雙方即在瑤池宴飲，吟詩贈答，而報以情意濃重的政治修辭。西王母首先唱道：

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⁷⁹

這首白雲之歌涵蓋天地，瑰偉雄奇，然在語氣之中又充滿對於穆王征途艱遙的體認，

⁷⁷ 見清·丁謙：《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叢書集成三編》第 7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卷 5，頁 421.2a。

⁷⁸ 相關研究甚多，可參見大衛·霍克斯：〈神女之探尋〉，收入於莫礪鋒編：《神女之探求——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28-52；魯瑞菁：《楚辭文心論》（臺北：里仁書局，2002），第四章「〈離騷〉「飛天」與「求女」儀式探求」，頁 153-199；大野圭介：〈楚辭「周流」考〉，《職大學報》1（2008），頁 24-26。

⁷⁹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 3，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4。以下數則獨立引文皆同。

以及遠人相互結好誠意的依戀，端莊中備見柔情。穆天子則鄭重答曰：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此一回答顯現出帝王的雄才大略，字面上表達了「和治諸夏」的夙願，以及雙方未來友好再會的期待；其中的潛台詞則是希望能因而堅固其與西北諸國的聯結，牽制犬戎，對抗淮夷。胡應麟盛稱「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若斯者也」⁸⁰。於是西王母又吟曰：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群，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意謂西王母之邦雖位居荒野，但也是雄霸一方；雖然不忍驟離，但衷心祝福周穆王能完成天命所賦予的使命，無乃是穆王帝王在事業上的知音與同志。

許多學者都將穆王會見西王母，將其視為美人／樂園追求的故事類型，「虎豹為群，於鵲與處」的西王母之邦，成了周穆王和神巫（化人）所做的巫幻之旅⁸¹；後更衍變為凡男仙女戀情滋生的樂園。⁸²更可進一步詮釋二者的神秘結合，意味著一種啟悟歷程，代表著英雄對生命的完全掌握。然而所有夢寐以求的美人，既是完美保證的化身，也是危險慾望的誘惑。⁸³因此，穆王與西王母間纏綿悱惻的贈答，既有美人柔情的呼喚與誘惑，也彰顯了英雄取得行為主導力量的宣言。

相對來說，從第五卷開始，主要是記周穆王巡行於中土，範圍約在南鄭至許昌一帶。一開始即記載了留昆、陵翟首領懼討王命，前來歸還寶玉、馬匹和寶物之事，並且貢獻寶馬，顯現周室對外的聲威逐漸轉隆。又在接見諸侯國許男爵時，提高其身份，命其去羊羔，用玉帛相見，並相與盡其歡酣，可見對內有和雍之效。其後的巡遊行動中，時常狩獵、捕虎，可作為軍事的操練，也設置了以圃田為中心的十個

⁸⁰ 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墳補逸·下〉，頁 454。

⁸¹ 如王孝廉：〈西王母與周穆王〉，收入於李亦園、王秋桂主編：《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6），頁 316-317。

⁸² 如苟波：〈中國古代「凡男遇仙」故事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2004），頁 56-57。

⁸³ 根據坎伯的說法，這種世界皇后女神兼具了好母親與壞母親的雙重性質，見 Joseph Campbe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頁 113-117。

山澤宮、建范宮、造西臺，以獵物祭祀祖先，善用山澤之木於民，拜夏啟故居，作詩哀民，可謂在治民方面，亦頗為積極，並有建樹。在敘述邏輯上，可與第四卷穆王「和治諸夏」的自我期許相符。轉機即在於「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⁸⁴周穆王在桑林中宴飲，並以觀賞女子採桑為樂，已稍見其逸樂之心。而後鄒公歌詩，似以〈昊天有成命〉，規諫穆王「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⁸⁵的祖宗家法；天子卻依然建重璧臺，以為西居。

前文已經提及，該臺乃是為美人盛姬而作。《穆傳》卷六言：「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上姬之長，是曰盛門。」⁸⁶姓者，所以「別婚姻」，一般加在女性的稱謂中。在周代的禮俗裡，同姓「百世不婚」⁸⁷，也就是只要同姓，不論親疏，即使相隔百代，也不准通婚。而穆王與盛姬正是同姓，兩人的婚配其實犯了同姓不婚的禁忌。《國語·晉語》載司空季子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⁸⁸意謂只有通過同姓不婚的族外婚，才能與不同姓氏的諸侯國之間建立聯盟，反之則可能因不敬而生怨，怨而釀災，災亂而有滅姓之禍。然年屆耳順之年的穆王，為了得到盛姬，特別尊榮盛伯，賜其榮居於諸姬之上，其間必定曾遭遇重重的阻力，甚至激怒同宗的貴族。

儘管如此，穆王對於盛姬的關愛，從生及死，處處洋溢於《穆傳》的敘述之中，其曰：

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

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

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

⁸⁴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5，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21。

⁸⁵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周頌〉，卷19〈清廟之什〉，〈昊天有成命〉，頁716。

⁸⁶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6，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24。

⁸⁷ 《禮記·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卷34〈大傳〉，頁619。

⁸⁸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點組點校：《國語》，卷10〈晉語四〉，9則，〈重耳婚媾懷嬴〉，頁356。

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

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

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萋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又流涕。⁸⁹

這裡從描寫穆王行獵在外，卻憂心盛姬的病情；奔勞在外，卻對盛姬的病體細心照撫；繼而敘述其由重璧之臺奔喪；又寫其死別前後情感上先憐後哀的變化，臨喪先是豫、傷心，而後流涕的種種波動，從此一英雄之淚，可以想見娥眉之多嬌、美人之情長。從另一方面來說，儘管穆王對盛姬如此牽絆，卻未因此而停下其帝王巡狩的行動，益可見其忠於其王者的大業，同時更加深了其不得相守的遺憾與悔恨。

《穆傳》卷六還有一連串的命名行動：「天子賜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台」，另外還有「曰寒氏」、「曰壺端」、「曰哀次」等等。每一次的命名，都是將過去的記憶重加銘刻。委婉表達其情深之至的感情過程。換言之，無論是與盛姬初遇的恩寵，還是後來盛姬染疾後的生死掙扎以至離苦心痛，穆王都不願讓這些記憶就此消失，故利用土石金木之堅，以承載易於流逝的生命記憶。

唯可爭議的是，天子命盛姬之喪比照皇后的葬法。無疑即是祭公在〈祭公解〉所說的「以寵妾蔽塞正后」的不當作法。宗法社會的形成，乃是一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尊崇共同祖先，內部區分尊卑、長幼、親疏，并以此規定繼承的順序，以此規範宗族成員各有不同的權力和義務，成為藉倫理之序以穩定制度秩序的法則。西周時期的宗法與政治密切結合，形成王朝內部的宗法制度；而喪禮祭祀也正表明宗法的實踐，其表明差序的遠近親疏，即是禮制的一環；如是之禮躐等而僭禮的作法，不僅危及皇后的權威，也錯亂了人際關係與倫理。

若從英雄歷險的原型來看，則通往應許之地的旅途中，充滿了塵世、身體與女人等各種誘惑，其中最令英雄氣短，淪為失敗的象徵者的還是「美人」，只是並非大

⁸⁹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卷 6，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以上引文依序見於頁 24、24、24、26、26-27、28。

地之母，而是如毒蛇般的女人、或狐狸精女人。換言之，若將西王母與盛姬兩相比較，二者同樣是穆王極盡追求的對象，但是與西王母的綢繆，正值穆王奮起事業的雄心，通往終極體驗，以體認天命的歷程；然與盛姬的遇合則是年老而情長，乃是白髮紅顏的匹配，而備體寒盡春來的喜悅，但同時也破壞了宗室的禮制關係，後來也成為其心靈上巨大創痛的來源。

如果《竹書紀年》的編年可信，那麼《穆傳》中的事蹟則大致有譜，但原本用按日記事的起居注形式，其敘述文本的秩序顯然已經經過有意的重構，因而打破歷史時間，重寫英雄、寶馬和美人交織的歷險敘述。同時，又將周穆王的遊征行動，區別為上升型的域外遠征與下降型的境內巡遊，上下交錯也就構成了穆王個人的傳記。這種傳、記混雜的事實，已成了中國傳記傳統中傳、記互為補充的常例，也即是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事件，作為人物生平的敘述主體。換言之，「記」可以記人、記事、記行，但通常屬於尚未賦予固定的歷史評價的材料；而「傳」則是針對人物的一生特殊的行徑賦予某一種史觀而下評論，因此形式上也可隨個人的特性，選擇生平功業、作品或者事跡作為傳記敘述的主體。⁹⁰《穆天子傳》作為雜史，由此可以歸納出對於周穆王功過的全新評價，已非完全從儒家聖王的禮制觀點立論，同時也兼顧了帝王之「心」的起伏與作用。

六、欲肆其心：事類隱喻的架構轉換

《穆天子傳》的基本結構雖皆為周穆故事，大致有其歷史史蹟作為根據，但在其整理和重輯的過程中不免滲入後人的創作意識，例如盛姬故事原本不屬於《穆天子傳》原書所有的內容，卻被有機地加入現有的文本中；而與前面西王母會的敘述，在穆傳中形成以兩位重要女性作為周穆生命轉折的界碑，然在歷史時間上其實有所

⁹⁰ 詳參拙作：〈王琰與生活佛教——從《冥祥記》談中古宗教信仰與傳記資料等相關問題〉，收入於李豐楙、廖肇亨主編：《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頁 227-281。

顛倒。如此結構性的改變，乃是後人的創作意識滲入所致。據此看來，西晉時代整理和重輯所透露的時代消息，並不是在力求還原歷史原貌之「實」，而是有意藉由穆傳所形成的帝王典範，在後來不同的歷史情境下賦予武力發動者具有征伐行動上的正當性。儘管該書採用古奧的文字，敘述中卻透顯出活潑的觀察力與想像力，更可直探帝王的人性與人情之「真」。在此一新的文本架構之下，周穆王欲肆其心之「心」，恐非如先秦所指涉的重在其巡遊征伐之心，而轉向了對帝王情意與倫理的思考，也與漢晉以來聖人論與情、禮關懷表裡相互呼應。⁹¹從上面一節的討論中，可知周穆王巡遊天下，始終盡責地貫徹其「和治諸夏」的政治理想，但是桑林飲宴與娶同姓女的作為，初看之下好似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卻隱然透露了帝王放縱情慾，任心於逸樂的行動，如此將形成帝王個人所欲肆之「心」而與國家秩序之間形成衝突而倍具張力。

周穆王故事形成事類隱喻的新發展，顯然與其出土後的文學環境有關，在當時貴遊文學集團特重事類運用的文壇風尚下，對於此一結合了帝王、臣輔、美人、寶馬、書方珍奇與強大外患的題材，無疑提供了無限想像的空間，因而藉此「巡遊」行動創作出各種不同形式之遊，周穆王於是也成為此一時期創作的箭垛式人物，分別擇取其敘述中的情節單元以寓託其意，在反覆述說傳誦的過程中，就更加深刻了周穆事類的新寓意，從而豐富了唐代詩人驅遣故實的廣度。由此正可見此一事類正處於新鮮而具有創發性的時期，足以激發諸家競才逞技，增飾新意，開發其豐盈的諸多面向。

首先就是嗜奇好異的郭璞（276-324），即曾經註釋過《穆天子傳》，在他喜好取材古典故實的詩賦諸作中，自然不會遺漏這種聖王與女主相會的良好素材。但必須先考察他對於《穆天子傳》的理解是常與《汲冢竹書》相提並論的，才能正確詮解其事類運用自有其意旨所在。如在〈注《山海經》敘〉中就說：

案《汲冢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

⁹¹ 相關論述極多，然最經典之作仍要屬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和〈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兩文皆見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頁 205-327；329-372。

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玫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

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騶耳，造父為御，犇戎為右，萬里長騫，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轅龜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騶耳驂騶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⁹²

由此可知，郭璞基本上將《汲郡竹書》與《穆天子傳》兩者均視為埋藏地下幸而出土的古籍，其記載不僅可以互相補益，亦可與當時現存史籍的記載彼此參證，並可作為校正《山海經》的材料以發明其言之不誣。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下，再去觀察郭璞詩賦的用典，就可以發現他很清楚地將周穆王的巡遊事蹟區隔於遊仙詩中帝王求仙的記載。譬如郭璞在〈遊仙詩〉七首之六，首先描寫人間災起，海鳥知避；巨浪吞舟，也拍岸蓬萊，然而仙境中卻一片祥和，得以雍容地鋪陳出陵陽子明、容成公、嫦娥、張洪崖、甯封子等仙紛獻其技的神仙群相，從而流露出對仙境的企慕之情，最後結語即曰：「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⁹³」，縱使燕昭王和漢武帝以帝王之尊，而積極求仙，終究徒勞，以此慨嘆世上學仙者都不得要領，同時也寓託了世間難得其人、不用其才的雙重遺憾。相對於此，郭璞筆下的周穆王則不同，他曾與西王母會面唱答，《山海經圖讚·上·西王母》言：

天帝之女，蓬發（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⁹² 見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附錄，頁 478-479。

⁹³ 有關「仙才」的討論，一般常引《漢武內傳》：「王母曰：『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事實上，李豐楙研究早已指出該書晚出，約在劉宋時期；且此一問題在葛洪《抱朴子內篇·論仙》已有討論，《漢武內傳》則是試圖反駁此說。詳見拙作：〈聖王·聖徒與凡夫——六朝漢武系列的編／寫系譜〉，收入於劉苑如：《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與空間書寫》，頁 374-379。

(藏本)⁹⁴

在此結合了《山海經·西次三經·玉山》中蓬髮戴勝、虎齒善嘯的怪異形象，與《穆傳》卷三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詩賦贈答的情節。其所讚者，正是遠荒之裔與中國王者的接觸，被求者與求索者的遇合，以及理想與現實的連結。因此，在郭璞的眼中，周穆王自不同於燕昭、漢武坐等方士致仙的帝王，而是積極進取的行動者。他在〈江賦〉中更進一步寫道：

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鼉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⁹⁵

文中回顧當年周穆駕八駿、濟鼉鼉，而直驅江淮的英姿。何以郭璞在鋪敘長江壯觀的同時，巧妙地穿插與長江有關的種種歷史傳說？其意在凸顯長江實為中國的歷史長河、文化淵源，其中更深一層的寓意，根據連鎖標的研究指出，目的是在賦予晉元帝江東即位的正朔地位。⁹⁶此後，寫帝王義師者莫不連周穆之事以為典，諸如顏延年（384-456）〈應詔觀湖北收〉、江淹（444-505）〈恨賦〉等皆是。

在兩晉南北朝之際，穆天子巡遊論述的架構則更明顯轉移，特別是王嘉（?-ca.390）《拾遺記》成書於佛道並盛的十六國時期，多少都遺存佛道競爭而自神其教的趨向。⁹⁷該書以中國歷代帝王譜系為經，侈談神仙怪異之事，其中卷三即以周穆王巡行天下為主題，表面上只是改寫了《穆傳》中八駿的名稱，由原本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華騶、綠耳等外形特徵為主的名字，改易為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等形容其奔馳神速的名字，實則意在配合聖

⁹⁴ 見郭璞：《山海經圖讚》，上卷〈西王母〉，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全晉文》，卷122，頁2160。

⁹⁵ 見郭璞：〈江賦〉，收入於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12〈江海〉，頁572-573。

⁹⁶ 見連鎖標：《郭璞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246-248。

⁹⁷ 參見王興芬：〈《拾遺記》佛學影響探源〉，《甘肅社會科學》1（2010），頁71。

王感應的主旨，極寫穆王的神智遠謀，於是召喚出諸方士仙術之要、神禽異獸之珍；更重要的轉變則是西王母的臨降人間，儘管還是由虎豹為前導，麟獐列其後，但此時王母已轉變為乘翠鳳之輦、曳丹玉之履的貴婦。在這場飲會中更是匯集了各種殊方珍奇諸物：如酒、花、菓、蓮、棗、桃、藕、蓬、橘，以及仙樂寶器。⁹⁸將穆王與王母的兩國交好之會徹底翻轉為神人之會，並藉由帝王之尊和聖王之智來強化神仙道教的合理性。

稍後，東晉時張湛重編的《列子》，其中〈周穆王篇〉融合了佛經故事，記周穆王神遊化人之宮，俯觀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回神後從此不恤國事，駕八駿而肆意遠遊，快樂逍遙的樣子被讚歎為「幾神人哉」，以致於「世以為登假焉」。⁹⁹本篇將周穆王周遊主題，與道家的遠遊結合，並加入迷離絢爛的幻術之遊，徹底顛覆感官經驗，引發「真」與「幻」的思考，開展重新認識世界的動機，最後歸納於及時行樂，追求現實享受的篇旨，又將悟道的君王美化為近乎神人的形象，大抵都與當時游仙詩的表現可以相通。可見這裡已將周穆的肆心遠遊哲學化，成為一種「治身貴於肆任」的人生觀¹⁰⁰；而〈湯問篇〉亦是在表達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目的在於使人們開拓視野，不要囿於成見，藉以講論如何認知和掌握「道」的問題。其中以周穆王北遊過終北國，三年忘歸；又西巡至弇山，巧工偃師獻所造倡者，始曉人之巧同乎造化之功；以及大征西戎，西戎獻崑崙之劍與火浣布，方知超乎事理之物亦有存在的可能性。¹⁰¹在此則又藉由周穆之遊帶領吾人的思想超越極限，從歷經最自然而無所機心的國度、到技近乎神的創造，以至於超越常理的奇物，在在都是要打破既有的經驗之知，回歸到一種均平齊一的態度。

綜言之，《穆天子傳》流行於兩晉國土由统一到崩裂之際，在文化上又適逢儒、佛二家與仙道思想彼此爭鋒競秀的時代，基本上《穆傳》被視為一如《山海經》般的奇書，既深為郭璞一類好奇文人所喜愛，而陶潛〈讀山海經詩十三首〉亦曾將兩

⁹⁸ 參見晉·王嘉撰，齊志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0-69。

⁹⁹ 參見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93。

¹⁰⁰ 見張湛：〈列子序〉，收入於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頁 279。

¹⁰¹ 見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頁 163-164；179-181；189-190。

者並列，吟詠「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之夏日閒趣，又曰：「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¹⁰²，可見其事非新，而在使用上卻已是新典，成為「遊觀」的新事類；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的巡遊敘述被進一步仙道化與哲學化，將政治意義的巡遊轉化為身體與心靈解放的新動作：遠遊、仙遊，乃至幻遊，此際周穆王作為巡疆護土的聖王之外，又被增飾了諸多面向：或扮演好神仙的帝王、或化身為道的代言人，不僅凸顯了兩晉南北朝善用事類，故事集成與新編的活力，也為後來唐代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庫，名篇者如有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四十三：「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¹⁰³，則將周穆與漢武同列為求仙帝王；或如李商隱〈瑤池〉：「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里，穆王何事不重來？」¹⁰⁴在一片仙氣瀰漫中，又寄託了另一時代文人的心事。

七、結論

傳統中國是一個喜愛故事、成辭的民族，特別是上層知識階層每以博聞強記為尚，應對屬文亦以能旁徵博引、巧喻善譬、曲盡義理為榮。王充《論衡·別通》即說：「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¹⁰⁵，充分表達出中國傳統士人階級重視閱讀、吸收古今行事與百家之言，並援引作為事類的特殊習性。所謂習性（*Habitus*），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認為的，乃是受到社會空間所主導的規則影響，內化為一種性情結構，這種性情結構又會自動地激發不同階層，各自擁有共同有的思想方式和認知結構，並將其付之實踐，成為一

¹⁰² 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十三首〉，收入於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晉詩》，卷 17，頁 1010。

¹⁰³ 見《全唐詩》卷 161。電子版網址為 <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2012 年 5 月 7 日上網）。

¹⁰⁴ 見《全唐詩》卷 539。<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2012 年 5 月 7 日上網）。

¹⁰⁵ 見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別通》（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591。

種固定的行為模式。¹⁰⁶

考察《穆天子傳》中周穆王遊征事蹟的來源、接受與變異，固然可以用周穆王生平傳記的眼光，將其視為摻雜了神話虛構成分的歷史敘述。事實上，在春秋戰國時期，這類書寫應該不是孤例，《國語·晉語四》兩次引瞽史之記，趙逵夫指出，所謂「記」，即瞽史講說歷史和先哲嘉言的提綱¹⁰⁷；而《逸周書·史記解》亦言周穆王命人定期為其講述前言往事之事。而這類講史在實際講說的過程中，必會依照特殊的情境與用心，調整述說的架構，使閱聽者覺得合情合理。換言之，倘若就將周穆王視為一個「事類」，而《穆天子傳》則是作為一個「先王」例證的一種詮說，既可用以取悅且滿足後世對這位一代雄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亦可把他納入現世的背景與體系，對應於同時喜好征遊的君王，重新框架議題，調節人們對議題的看法和感覺，以此詮釋帝王遊征的意義。

在中國歷史書寫傳統中，「求真」與「致用」形成永恆的辯證，但「實錄」精神仍是維持歷史書寫獨立的基礎所在。職是之故，與其將這類借題發揮的歷史敘事，強名之為「史」，不如將其還原至政治神話的解讀層次，誠如葛哈德·貝林格（Gerhard Belliner）《神話學辭典》所言：

不同於傳說，神話會要求存在的關聯性，它要的是對現實的可信解釋，而不是不實在的「杜撰的東西」，即使從「物理」的角度去看，神話是從事實性的意義去解釋非現實的東西，……神話是人類闡釋現實的基本形式，透過敘事的方式，現實變得歷歷在目，栩栩如生。經由神話的敘事，人類直接體驗到現實，沒有距離，而且感到很親切。¹⁰⁸

從這種角度來檢視《穆傳》，觀察周穆王與敘述者之間「存在的關連性」，正可觸及其所體驗的現實——也即是英雄成敗的背後所有的人性關懷：周穆王非不欲敬天法祖，非不知逸樂之危害，然而來自心靈深處的欲望，含藏不可限的意義動力，並不

¹⁰⁶ 見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並參見張意：〈文化研究關鍵詞之三〉，《讀書》3（2006），頁 152-156。

¹⁰⁷ 參見趙逵夫：〈論先秦時代的講史、故事和小說〉，《文史哲》1（2006），頁 54。

¹⁰⁸ 葛哈德·貝林格著，林宏濤譯：《神話學辭典》，頁 4。

斷發展，而自行超越，催逼著臨老的英雄駕著寶馬，邁向征途，追尋美人。這是由內在而超越的根源動力。而所謂「內在超越」並非一種唯心的過程，乃起自欲望，發自身體，並在逐層上躋的發展過程裡貫穿心靈與精神，因而獲得提升與轉化。這種「真實」的傳遞，正是建立在敘事的基礎上。進一步來說，敘事其實就是對世界一種隱喻地闡釋；任何一個敘事文本都是關於世界存在的隱喻文本，傳達對於世界存在的認識，隱喻地揭示了世界存在的本質。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注：《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別通》，北京：中華書局，1990。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漢·趙岐注，宋·孫奭正義：《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賈公彥正義：《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晉·王嘉撰，齊志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收入於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晉·郭璞注，袁珂點校：《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梁·沈約注，洪頤煊校：《竹書紀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唐·孔穎達等正義，唐·陸德明釋文：《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據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影印。
-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清·朱右曾校釋：《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
-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 逢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集注：《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點組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李滌生集釋：《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二、近人論著

- 清·丁謙：《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叢書集成三編》第7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 大衛·霍克斯：〈神女之探尋〉，收入於莫礪鋒編：《神女之探求——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28-52。
- 王孝廉：〈西王母與周穆王〉，收入於李亦園、王秋桂主編：《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6，頁299-318。
- 王保國：〈從《呂刑》看明德慎罰思想在西周的演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1（2003.1），頁27-30。
- 王貽梁：〈《穆天子傳》的史料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1994），頁51-55。
- 王興芬：〈《拾遺記》佛學影響探源〉，《甘肅社會科學》1（2010），頁69-71。

-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君臣關係初探〉，《臺大歷史學報》21（1997.12），頁 32-34。
- 朱淵清：〈王家台〈歸藏〉與《穆天子傳》〉，《周易研究》6（2002），頁 9-13。
-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濟南：齊魯書社，2003。
-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
- 李海默：〈「翦商之志」的落實：再論晉武帝的建政地理模版〉，《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11），頁 5-25。
- 李凱：〈五帝時期的巡狩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3（2008.6），頁 147-152。
- 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3（1988），頁 8-11。
- 周書燦：〈《穆天子傳》研究論述〉，《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2（2003.3），頁 58-65。
- 苟波：〈中國古代「凡男遇仙」故事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2004），頁 56-60、76。
- 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范進、楊君游、柯錦華譯：《國家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tate*），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 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馬振方：〈大氣磅礴開山祖——《穆天子傳》的小說品格與小說史地位〉，《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0：1（2003.1），頁 83-88。
- 張公量：〈略論《山海經》與《穆天子傳》〉，《華北日報·史學周刊》，1934年11月22日。
- 張公量：〈《穆傳》之版本及關於《穆傳》之著述〉，《禹貢半月刊》2：6（1934），頁 18-27（總頁 220-229）。
- 張心澂：《偽書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 張意：〈文化研究關鍵詞之三〉，《讀書》3（2006），頁 152-156。
- 張廣志：《西周史與西周文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
- 陳森：〈滅吳前後的晉武帝〉，《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989），頁 50-56。

- 連鎮標：《郭璞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 渡邊義浩：〈陸機の君主觀と「弔魏武帝文」〉，《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49(2010.3)，頁 27-52。
- 商豔濤：〈金文中「征」值得注意的用法〉，《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2007.10），頁 143-144。
- 葉達雄：〈西周昭穆恭懿孝夷時代的內政措施與對外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5（1978.6），頁 1-17。
- 程元敏：〈《尚書·呂刑》篇之著成〉，《清華學報》15：1/2（1983.12），頁 1-26。
- 黃光：〈荀勗在目錄學領域中的貢獻〉，《學習與探索》11（2008），頁 146-147。
-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葛哈德·貝林格（Gerhard Belliner）著，林宏濤譯：《神話學辭典》，臺北：商周出版，2006。
- 楊樹達：〈毛伯班簋跋〉，收入於氏著：《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52。
- 楊樹達：〈毛伯班簋跋〉，收入於氏著：《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99。
- 楊義：〈《穆天子傳》的史詩價值〉，收入於氏著：《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76-107。
- 鄭杰文：〈關於《穆天子傳》出土、整理、流傳諸問題的考辨〉，收入於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古籍整理與研究論叢》第一輯，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頁 57-76。
- 鄭杰文：〈《穆天子傳》知見版本述要〉，《文獻》2（1994），頁 170-196。
- 鄭杰文：《〈穆天子傳〉通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
- 趙奉蓉：〈虔虔在位追跡文武——《逸周書》中周穆王形象〉，《理論界》8（2008），頁 129-131。

- 趙逵夫：〈論先秦時代的講史、故事和小說〉，《文史哲》1（2006），頁 53-58。
- 衛聚賢：〈穆天子傳研究〉，收入於氏著：《古史研究》第 2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187-245。
- 衛挺生：《周自穆王都洛考》，臺北：中華學術院，1970。
- 韓梅、孫福軒：〈「望祭」、「望祀」議〉，《中國史研究》4（2006），頁 8。
-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軍事〉，收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殷商史研究中心編輯組編：《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 228-251。
- 劉苑如：〈聖王·聖徒與凡夫——六朝漢武系列的編 / 寫系譜〉，收入於氏著：《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與空間書寫》，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頁 345-416。
- 劉苑如：〈王琰與生活佛教——從《冥祥記》談中古宗教信仰與傳記資料等相關問題〉，收入於李豐楙、廖肇亨主編：《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頁 227-281。
- 魯瑞菁：《楚辭文心論》，臺北：里仁書局，2002。
- 顧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1：2（1951.7），頁 63-68。
- 顧擘鋒：〈《穆天子傳》成書時間研究綜述〉，《長春理工學報(高教版)》2：4(2007.12)，頁 47-53。
- 小川琢治：〈穆天子傳考〉，收入於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93-256。
- 大野圭介：〈楚辭「周流」考〉，《職大學報》1（2008），頁 24-26。
- Herman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立緒出版社，1997。
- Peter Bol, "Ethnicity versus Culture under the Empire." 收入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61-106。
- 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全唐詩》檢索系統。網址：<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2012年5月7日上網）。